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再现”研究

刘希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

目次

- I. 引言
- II.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域的“再现”
- III.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视域的“再现”
- IV. 中国女性再现的批评实践

摘要: 本文以“再现”这个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为切入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语言学转向”以及“物质转向”的背景下,探讨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走向和范式发展。考察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如何既承续后结构理论的一些批判性视角,又能结合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规避后结构理论可能造成的文化主义倾向,在文化批评的同时注重对物质性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思考,从性别、阶级和族裔等多重视角对文学和文化文本进行历史性和交叉性的研究。

关键词: 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唯物主义; “再现”; 女性主义批评

* 刘希,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 Email: xi.liu@xjtlu.edu.cn。

I. 引言

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实践一直受到多种理论资源的影响，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理论话语给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提供了多样的批评范式和分析方法。不论何种理论话语影响下的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其基本目标之一都是反思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与种种文化实践的关系，高扬妇女作为文化生产的客体的批判性或者主体的能动性。在“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之后的西方学界，种种“后学”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已经有中国学者初步梳理了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批判理论特别是种种“后学”对于中外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实践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苏红军 & 柏棣，2006；王淼，2008；刘岩，2011；刘希，2021）。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界又有的新的反拨“文化转向”的“物质转向”思潮，而它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梳理。本文将延续这些讨论，以“再现”这个当代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为切入点，探讨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走向及其范式发展，考察在“语言学转向”以及后来的“物质转向”的背景下，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如何既承续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视角，又结合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规避后结构主义理论可能造成的文化主义倾向¹，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同时注重对物质性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思考，从性别、阶级、族裔等多重视角对文学和文化文本进行历史性和交叉性的研究。

II.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域的“再现”

“再现”或者“表征”（representation）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文化研究之父”、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Hall, 1997: 17）在其《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提出：“再现是借助语言对我们头脑中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是联结概念与语言的纽带，能使我们指涉物、人或事的‘真实的’世界，或者虚构的物、人和事的想象的世界。”他考察了人如何经由语言表达意义，分析了“再现”的运作机制，并借助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符号学、语言学、解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等资源，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反驳了反映论路径（the reflective）和意向性路径（the intentional）。他认为语言并非像镜子一样客观反映已经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也并不是言说者将他/她自己独特的思想传递出来的中介。霍尔提出，我们要采用一种建构主义的路径（the constructionist）去理解意义的生产：无论是事物本身，还是语言的个体使用者，都无法确定语言的意义，意义是由社会行动者使用“再现（表征）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s）来建构的。因此，意义不是客观事物那里固有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是一套意指系统的结果。客观世界和我们的思想观念、语言之间有着复杂的中介（mediated）关系，而并非我们的思想借助语言对现实进行客观、直接或透明的还原与呈现。语言、符号最终受制于历史，事物的意义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被生产出来，并且随着历史变迁不断变化，而不会被永远地固定下来。“再现”也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性”（discursive）的范畴，作为知识生产的来源之一，它与社会实践和权力问题紧密关联——话语会引起人们的认同，可以生产不同的主体位置，进而在这些主体立场上生产出新的知识。霍尔在提出文化再现理论时，通过分析大众文化中的“他者化景观”，批判了文化再现实践中的常

¹ 文化主义倾向是指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过度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其他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如在解构文化符号和意义时过于关注文本本身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而较少考虑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或在分析社会不平等时，更多地关注语言和符号如何构建和维持不平等，而较少考虑经济制度、阶级结构等更为根本的因素。

见的刻板印象化 (stereotyping) 和“他者化” (Othering) 现象。他以大众文化中的种族形象为例, 揭示刻板印象如何作为再现实践, 经过本质化、还原主义、自然化、二元对立等运作, 卷入以霸权、权力/话语为形式的权力游戏中。霍尔 (Hall, 1997: 277) 更提出具体的对抗策略, 鼓励将负面的刻板形象转换成具有新意义的符码, 并开展“再现政治”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一场关于意义的持续斗争。“再现政治”实际上也是关于关乎话语场域中的被再现者如何可以自我再现 (self-representation), 如何可以被听到的问题。

关于再现和话语的这些建构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深刻影响了很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后殖民主义理论中, 关于文化再现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指出, 殖民者是如何通过持续的表征为被殖民者构建一种非欧洲的、低等的种族身份的, 而这一再现过程是如何巩固西方帝国主义的; 而在底层研究中, 则探讨了底层是否可以被代言、被再现的问题; 如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体框架”研究就认为新闻媒体所刊载的内容并非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研究者可以分析大众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媒体框架, 如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过度再现、低度再现还是错误再现, 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报道呈现出正面、中性还是负面的立场等。此外, 从“再现”视角出发, 文学或其他文化文本即使持“现实主义”的立场, 实际上也并非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和直接的反映。同时, 即使创作者承认文化文本的虚构性, 也并不意味着文本就是创作者纯粹主观世界的反映。文化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套意指系统和话语实践, 与现实有着复杂的中介的关系, 且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可以生产权力关系并建构主体位置。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克丽丝·维登 (Weedon, 2011) 曾以英国文学研究为例指出,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之前, 对妇女和性别问题的文化文本研究中曾有两种代表性研究视角: 一方面, 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解读为对现实世界中的女性经验的真实表达, 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目标是挑战被歧视的女性形象, 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给女性作家以合法的地位, 并努力构建一个女性写作的传统。这种解读方式的前提是女性主体是充分自主的, 并默认了语言的透明性和文本表达中经验的真实性。另一方面, 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则将文学作品解读为对本质的女性主体性的表达, 认为这种主体性可能是被压抑的, 但往往有着巨大的颠覆性的力量。这种解读方式挑战了对语言的透明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与固定性的认识, 但也存在对性别、象征秩序 (symbolic order) 与潜意识结构的非历史化的理解, 从而亦无力考察种种挑战和改变的可能性。而后结构主义理论因为视主体性为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主体位置, 将性别主体性视为在意指实践之内被话语性地被建构而成的, 因此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再现”与现实、经验的关系。对妇女和性别的再现并非对现实的客观还原或直观反映, 它们自身也是一套符号和表意系统, 其生产出的意义并不是它们声称要去代表的东西即“所指”, 而是来自于它们在什么位置上对“所指”或者现实相勾连。如女性主义文本告诉我们当时“流通”着什么样的性别话语并相应地生产出什么样的主体位置, 这样才能让我们对父权制的特殊结构以及抵抗的可能性做出洞察。

同时, 在妇女学和性别研究界,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再现”和性别间的复杂关系。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 (Scott, 1986: 1067) 曾提出一个对社会性别 (gender) 的重要认识: “社会性别是基于‘被认为的’两性间的差异的一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元素, 是指征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她认为研究社会性别的方法, 首先是对引起了对多样且矛盾的性别再现的文化象征 (culturally available symbols) 的研究, 如将妇女视为光明或黑暗、纯洁或污秽、无辜或腐化的象征的文本是在何种语境下被怎样创造出来的。其次是对各种影响了我们对这些文化象征的解读的关于两性的规范性概念 (normative concepts) 的研究, 它们以固定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于宗教、教育、科学、法律和政治的学说中。因此, 斯科特首先关注的

就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再现”出来的社会性别。而女性主义理论家特里莎·德·劳里斯（Lauretis, 2007: 202-203）受到福柯关于“性的社会机制”的理论影响，提出要“把社会性别看成是一种再现与自我再现，是各种社会机制，譬如电影院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并认为“社会性别的再现”其实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她进一步认为这种建构不仅仅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媒体、学校、法律、家庭内进行，还在学术界、知识分子圈，甚至在女性主义内部进行着。

无论是将社会性别理解为一种通过建构性别差异而指征权力关系的方式，还是一种通过再现和主体建构而达成的意识形态，这些视角都促使我们在考察对妇女和性别问题的“再现”时，不再主要看“再现”是否歪曲了现实，而是去研究“再现”这个符号和意指系统所生产出来的“现实”及种种规范、差异和认同；不再把“性别差异这个父权制的重要基础视为外在于再现系统的再现的客体，而是视为再现系统造成的结果”（Cowie, 1990: 118）。同时，我们对父权制也有了新的认识：父权制是基于性和性别的一套社会统治体系，更是“通过在性轴线上建立社会性的性别差异而形成的一套社会心理关系的网络”，它“深深植根于我们对性身份认同的意识之中，看起来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Pollock, 1988: 33）。这种新的认识也让我们重新考量了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目标：不再是妇女或者性别议题的再现是否扭曲了（真实的）参照物，而是这种文化再现所声称为真实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差异，以及支撑了这种话语背后的种种社会规范。因为相对于作为性统治体系的父权制结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还要将父权制视为一种建构了性分化（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观念体系。

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者开始聚焦主体性、身体、性本质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意义的符号结构。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对“再现”/文本、现实和意义生产的立场出发，我们需要坚持意义的流动性原则，并将研究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成了的产品的“意义”。琼·W·斯科特（Scott, 2001: 284）在谈及福柯时指出：“后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文字和文本没有固定或内在的意义。在它之间不存在透明或不言而喻的关系。无论是思想还是事物，语言与世界之间没有基本的或终极的对应关系。那么，在这样的分析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何种具体背景下，在哪些特定的人的区域中，以及通过什么文本的和社会的过程，意义才最终被获得？更普遍的问题是：意义是如何变化的？有些意义怎样作为规范性的东西出现，而其他的意义怎样消失或被遮蔽？这些过程揭示出的权力的构成和运作是怎样的？”

这些都成为我们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可以提出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对于历史记载的，还是对于各种文化文本如文学、影视等“再现”的研究，都可以从这种意义生产、话语建构、主体形成和权力运作的角度去分析。维登（2011: 199）建议文学研究者在文学再现和性别的关系上采用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形式：“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而言，文学乃是对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之运作的许多特殊情境之一。文学不是反映或表达着社会生产的或本质的女性（womanhood），而是如其他话语形式一样，意图显要地建构出女性或男性‘自然的’存在方式。虚构作品提供给它们的读者以主体位置与主体性模式，这些模式意涵着特定的意义、价值和享乐形式。作品所提供的那个社会见解的中心，就是对女性性质的特定定义，以及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的关系。”

因此，后结构主义可以说是我们针对文化再现问题开展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它启发我们注重“再现”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以及“再现”的生产和阐释过程中的政治性和批判性。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1994: 157）就认为对“权力无所不在，甚至存在于批评家自身”的这种认识是作为政治参与的批评的先决条件。作为在英文表达上的同一个词汇“representation”，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再现”（描绘、

符号、象征等)与法学和政治意义上的“代表”(或代理、授权、权力分配等)其实关系密切。对“再现”的政治性的深刻认识启发我们将妇女或者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自我再现”也视为一种“再现”，它也有其话语性和与权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跟各种等级性的差异的建构。并不是说当某一社会群体开始自我再现的时候，他/她生产相关知识、建构相关话语的过程就是透明的和可靠的。对于底层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即斯皮瓦克(Spivak, 1988: 283)的“底层可以说话吗”，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首先，知识分子针对底层人提出了“再现”或“代理”的问题，他们认为无论底层是否可以“说话”，有无“能动性”，“代言”本身的权力关系都是需要被审视的。其次，当底层进行“自我再现”时，他们的发言并非透明的现实反映，也不一定有统一的或自觉的声音，也经过了社会话语的调节。贺萧(Hershatter, 1993: 119)曾认为“底层不能说话”实际的意思是他们“不能在话语中再现自己”，而同样经过了社会话语的调节。周蕾(Chow, 2001: 46)也提出，“再现，甚至是对自我的再现，总是需要与那些使‘自我’变得不透明而不是清晰的异质性因素相妥协。尽管被想象为知识的终极来源，自我其实也并不一定‘懂得’自己，也不能被归结为理性认知的范畴。”因此，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再现”和“性别”的研究就是要坚持文化文本是意义的建构，而非意义的反映，将种种文本视为历史性生成的话语性产物，考察它如何为读者建构意义与主体位置，及其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不同效用和政治意涵。而不同文本对于妇女经验和主体性的“再现”同样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产物，在其中我们可以关注权力是如何经由文化话语来指征的，特别是“性别差异”的话语是如何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以及“抵抗”在何处出现，其产生又何以可能。

尽管没有直接借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个理论(苏熠慧, 2016; 张也, 2018)，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很多理论家在考察“再现”与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建构时也并不仅仅只看到社会性别，而是同样注重阶级、种族、职业、年龄、性倾向等多种社会范畴坐标上的意义生产。这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本身对“女性”以概念的去本质化的多义性理解密切相关。劳里提斯在其“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就注意到，温迪·霍尔韦(Hollway, 1984: 237)在研究权力关系、社会性别差异与主体意识产生时发现，权力与主体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妇女们在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实践与身份体系中进行了不同的投入，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而且也能解释“社会差异的其他主要方面，譬如阶级、种族与年龄，它们与社会性别相互交叉来支持或冷落某些立场观点。”维登(2011: 197, 200, 206)在论及“解构”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时就认为它提供了方法“去解构那些加强了性、种族和阶级压迫的阶层性对立(hierarchical opposition)”，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则类似于打一场关于“作品意义的话语战役”，并在这场战役中考察为什么“特定解读的正当性以及其它解读的被排除，代表了女性的、阶级与种族的利益”，这样才能深入研究具体的文本究竟建构了什么样的主体性模式，因为“主体性在社会过程与实践——经由这些过程与实践，阶级、种族和性别权力的形式得以行使——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周蕾(Chow, 2001: 49)认为，当代文化研究不断向我们表明，“‘再现’不能脱离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Fraser & Nicholson, 1994: 258)在讨论我们应当如何避免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造成的误区时也提到，即使女性主义需要回应“千变万化又千篇一律”的性别不公问题，但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也仍要采用一种“非普遍主义”(non-universalist)的立场，摒弃单一的“妇女”和“女性性别认同”概念，而代之以多元复杂的建构性社会认同，将性别视为一个相关的链条，同时兼顾阶级、种族、族裔、年龄和性取向。如此一来，在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之后，女性主义的议题设定“已经从‘为何有压迫，以及如何终结它’转移至‘对女性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和“去成为某种女性意味着什么”(Torney & Townshend, 2006: 116)。

III.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视域的“再现”

近年来，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意义的符号结构和权力问题一直成为女性主义者女性的研究焦点，这种倾向看起来越来越远离对物质/结构变迁的关注。因此，应该怎样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和物质与文化、话语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阿里夫·德里克（Dirlik, 1999: 11）就曾批评后殖民主义中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主义倾向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具有共犯特征：“如果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理解，这样的理解对欧美主宰世界的批评是不够的，因为这种主宰不仅仅是‘话语’的主宰，而是深植于权力结构之中……这并不是说文化和话语无关紧要，而只是重申它们作为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不够的；将文化和话语与物质世界分离，本身就是非常现代的做法。”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性别研究中的再现问题。苏红军、柏棣（2006: 21）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米歇尔·巴莱（Michele Barrett）提出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权力和话语理论“使实践经典的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越来越困难”。近年来中外很多学者思考后结构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文化主义”倾向，特别是可能影响我们对压迫性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妇女所从属的物质性的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本身也是复数的，并非所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派别都倾向以语言取代物质和受压迫的权力关系。如维登（2011: 124）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就始终强调话语实践与物质权力关系的结合，指出“话语实践乃是被深置于物质权力关系之中；而物质权力关系亦需要转化，以使变革得以实现”。这可能与维登对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有关。维登（2011: 32, 37）认为，女性主义者需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之间所做的联接，以及意识形态在社会权力关系之特定形式的再生产之中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她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转译”成后结构主义的术语，即“话语、经济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关系”，对这种通过话语对社会权力的分析并不一定要全部还原为资本/劳动关系和阶级分析，因为后结构主义需要有空间留给其他形式的权力关系，如性别和种族。巴特勒（Butler, 1994: 160）也认为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主体”是“充分嵌入到各种物质实践和制度安排的组织原则中，并在这种力量和话语的矩阵中构建而成的”。

米歇尔·巴莱（Michele Barrett）也很早采纳了阿尔都塞的关于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有着相对的自主性的观点，去剖析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深深嵌入于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但是她“无法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来说明性别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Tormey & Townshend, 2006: 119）。劳里提斯（2007: 206-208）在讨论社会性别机制时，也借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她认为虽然阿尔都塞的理论本身不涉及对社会性别的讨论，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如“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将具体的个人‘建构成’主体的功用”，却可以启发我们把社会性别这个传统上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同样视为一种通过建构主体而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同时，劳里提斯（2007: 213）提醒我们，女权主义可能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如等级观念、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人文主义乃至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sexism）的共谋关系。

那么，对“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坚持能否成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连接点呢？有学者认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内在于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并对维持这两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思想和信仰体系——的关注能否、并且如何采用或适应后结构主义方法”（Wingrove, 2015: 455）。更进一步，对于主要研究种种文化符号、编码、“再现/表征”的学者来说，我们可以在后结构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关系吗？

如何将文化和话语重新与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联系起来？

其实在语言学转向前后，很多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们在讨论物质性的时候都包含了对文化以及“再现”的力量的讨论，即使再现活动或者上层建筑本身被认为有其自主性，但物质性或人类的种种“感性活动”仍被认为是“再现”等语言和符号实践发生的场所。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意指实践、话语还有人的心理的“物质性”呢？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

在对心理结构的理解上，女性主义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的学者南希·哈索克（Hartsock, 1997: 471-472）所持有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客体关系理论，将分析重点转移到了心理学上的人格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由性别分工和“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抽象要素所塑造的自我关系（即意识）占据了中心。但对她来说，最根本的立场在于认清压迫是社会的基本现实，并在注重社会分析视角的多样性与女性主义立场时确认一个物质性背景。跟哈索克一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也注重所谓“心理认同”的社会性。卡普兰（Kaplan, 2003）认为，文学作品恰给了以上那些“同时刻写”（simultaneous inscriptions）以叙述形式，并进一步指向了社会和心理认同的碎片化性质以及“社会意义的心理化再现方式”（the ways in which social meaning is psychically represented）。卡普兰（Kaplan, 2003: 175-176）指出：“我们必须把心理重新定义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内容。这样做并不是要脱离将种族和阶级考虑进来的女性主义政治，而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些社会分化和性别印记是如何相互保护和赋予意义的。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努力对此进行改变。”这种对于心理的社会性的考察可以追溯到阿尔都塞。受到拉康（Jacques Lacan）影响的阿尔都塞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去考察心理与社会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个体与他们所在的真实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再现。

对于社会话语的物质性理解，卡普兰（2003: 163）认为，以“阶级”为例，很多社会主义批评家也没有将他们的研究对象——文学文本——“作为生产阶级意义的重要场所，因为它们看起来离真正的经济和政治的决定因素距离太远”，而“阶级的一切物质关系在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因为语言本身是物质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也非常值得探讨。唐纳·兰德里（Donna Landry）和杰罗·麦克林（Gerald Maclean）所倡导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观”，他们提出的对各种文化和社会产品的批判性研究其实是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继承。兰德里和麦克林（Landry & Maclean, 2005）认为，相较于阿尔都塞，威廉斯充分发展了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及其能动性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对于威廉斯而言，语言是‘实践性的意识’，一种在世界中具有物质后果的思考和活动方式……威廉斯将对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掌握物质现实的重要方式。他认为需要一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关于物质性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会被发展出来。威廉斯努力把人类主体作为文化的能动者放回到唯物主义的辩论中。”（Landry & Maclean, 2005: 5）

如一些“后社会史”（post-social history）学者所认为的，我们应当打破客观论和主观论的二元分化，同时质疑意向角度的说明和结构角度的说明，认清意识形态和话语在个体基于社会物质存在条件中的中介作用：“人们始终是通过某种话语性的社会想象的积极中介过程，来体验其社会世界，或与该世界结成蕴含意义的关系的。这种社会想象赋予社会实在以意义，将历史性的存在赋以利益与认同，并引发蕴含意义的行动，引导它，赋予它人们心中的感受。……话语确实通过将自身投射到事件中，积极参与了社会事件、过程、关系与制度的塑造。”（Cabrera, 2004: 125）另一位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同样认为话语和知识是具有物质性的。她认为将话语理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可以看到语言、话

语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关系。“将话语概念化为意识形态，为女性主义理解权力/知识关系的物质性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在我看来是推进了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框架。”（Hennessy, 1993: 100）她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和“接合”（articulation）理论以及米歇尔·佩舍（Michel Pêcheux）的“话语间性”（interdiscourse）理论的启发之下改造了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亨尼西（1993: 84-85）认为：“如果我们不把主体性或‘经验’作为有别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东西来对待，那么女性主义的目标就会得到最好的实现。在将主体性与其他社会和物质领域割裂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巨大的批判潜力和女性主义作为解放性的社会运动的目标被破坏了。”亨尼西在话语的物质性问题上，反思了福柯的后现代话语理论对性别和对帝国主义不彻底的反思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性。她认为在话语的物质性上我们要坚持女性主义立场，看到话语理论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女性主义致力于理解跨越多种差异形态——种族、阶级、性别、性——的对‘妇女’的话语建构，它需要一个问题意识，以解释对差异的话语建构与形塑这些话语的剥削性的社会安排之间的联系。我们宣称要打破西方知识在复刻剥削上的共谋关系，这个立场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理论话语的物质效果。”（Hennessy, 1993: 65-66）她也批评了劳里提斯没有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和多元主体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联系起来。笔者非常认同亨尼西在话语的物质性问题上做出的思考和论述，因为我们最终需要明晰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卷入剥削性的社会关系的对不同形式的差异的建构过程。

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再现”研究，亨尼西（1993: 92）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研究，发展出一套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也即是反霸权的批评话语去研究所有意义生产实践。她借鉴西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关于“危机诊断”（crisis diagnosis）的理论，认为我们可以首先指出文本逻辑中的内在矛盾，从中看到其历史性；然后将文本危机去拜物教化（de-fetishizing），将其解读为对矛盾的历史性力量的意识形态置换；最后用隐含于文本危机中另类叙述来取代文本的问题。她认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成社会的转变，因为文本内在的矛盾其实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造成危机的发生。这种“症候式阅读”完全可以为女性主义所用，因为它将任何文本都视为历史性矛盾的产物，考察特定文化文本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上的话语接合，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将主体性视为意识形态/话语位置性，从而有助于揭示文化文本中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看到文本背后的历史性、剥削性的社会关系。

亨尼西也认为，对主体的建构正是话语的物质性作用之一，因为主体就是被很多等级化的差异所构建的，而且这些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往往是历史的和系统的，如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黄继锋，2004: 24）。卡普兰（2003: 149-150）也认为，我们在从事文化研究时，不仅要文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同时还要考察文本的语言过程和它在这些条件下建构和定义的“主体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理解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固有的、超越性的女性主体性的理解。虽然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帮助女性主义打破了这种迷思，把写作、性征与主体建构的关系加以复杂化，但是却缺少了对社会性别以外的社会分类的分析。因此，应当把“主体性”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建构的意识形态”，并看到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的多元作用。

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主要解释效力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作为历史和政治产物的性/性别体系的非自然化”，将“压迫作为分析中心并给予相应的解释和行动”，同时将差异“作为统治、剥削和异化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其条件”进行解析，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对意指系统的分析是怎样促成、确认、阻碍或挑战以上这些解释性要求的”（Wingrove, 2015: 460-461）。我们认为，在文化文本研究中，我们对各种等级性的差异的解构及其历史性、政治性的分析，可以同时结合后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工具，将对“再现/表征”的结构和意义的研究与对宏观语境的勾连和意识形态分析联结起来。早在1978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集体”（The Marxist-Feminist Literature Collective）就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方法，认为对“再现”的研究可以将这些视角结合起来：“文学文本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性的，它们不能给我们关于社会形成的知识，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在文化分析中同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现实关系的想象性再现（an imaginary representation of real relations）。一种对作为文学生产的一个关键决定性因素的性别加以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方法，可以提供一种将文学作为性别差异化的意指实践的更优理解。这并不是要把性别凌驾于阶级之上，而是要挑战一种将女性写作分离出去的男性写作和批评的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的可能性有相当大的兴趣……但我们认为，只有将两者综合在一起（尽管这将被问题化），我们才能弄明白至关重要的父权制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The Marxist-Feminist Literature Collective, 1996: 329-330）

以该小组的一个成员卡普兰的理论为例，她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交叉性视角和文本解构结合起来的方法非常富有启发性。卡普兰（Kaplan, 2003）在其最有影响力的《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一文中认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来说，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现代批判理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破解种种被自然化和本质主义化了的身份认同概念以及那些关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静态话语。但同时她也认为，我们对这些理论在意义生产研究方面的应用必须关注到各种差异系统对文化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性的差异。女性主义批评最为关注的性别话语，特别是性别二元对立的观念，往往“通过其他社会和文化术语，其他类型的差异”被制定或者打破。“阶级和种族意识形态浸润于并且通过性差异的语言来表达。阶级和种族的含义并不是性的隐喻，反之亦然。虽然不够确切，但最好把它们视为通过一种叙事方式、一组意义链中的关联术语相互建构的结果。了解性别和阶级——如果只分析两种范畴——如何互相绞合和表达，将改变我们对它们每一项的分析。”（Kaplan, 2003: 149）因此，卡普兰认为，女性主义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规定社会和心理意义的不同类别（性别、阶级、族裔等）之间表达出的亲密关系”的“异质性”要素上。承继后结构主义对“再现”的建构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卡普兰（2006: 168）认为“再现都不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它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分化和意识形态通过心理结构发挥作用造成的历史影响的结果，并在性和社会身份中起作用”。文化文本本身并非一个统一的东西，“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异质性的话语，挪用、语境化并评论了对其他阶级和性别的‘语言’”（Kaplan, 2003: 165）。因此，以十九世纪的小说为例，无论小说的现实模仿性或者写实性有多强，它们都可以透露给我们“维持当时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强大的阶级和性别象征的力量”以及“社会和性别差异之间的互相刻写”（Kaplan, 2003: 167）。研究者可以通过对作者和人物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限制的考察去发现阶级和性别的历史性交会。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兰德里和麦克林（Landry & Maclean, 2005: 90）也认为需要对多种差异政治，包括“阶级、性别、种族、族裔、性征、国际、后殖民性、宗教和文化认同”进行社会批判，并且认为“文本性”（textuality）的女性主义研究尤其要关注不同的差异性再现和这些再现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他们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仅主张阶级矛盾与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社会实践中的矛盾的物质性，还承认更多其他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它们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且具有物质基础和物质后果，如种族、性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Landry & Maclean, 2005: 229）。¹

可以说，对于如何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关系，以上这些女性主义

¹ 关于（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怎样反思和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参见刘希 & 郁旭映（2023）。

学者们都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和努力。“要成功地维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三者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乃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从解放观点来说，这仍然比放弃这种三者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还要更为可取。”（Torney & Townshend, 2006: 116）一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反思了单一的后现代主义视角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宏观结构分析的放弃，使其削弱了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政治性。他们认为，“因此至少需要对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大叙事（large narratives），对宏观结构和制度的经验的和社会理论的分析，对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的互动分析，对文化生产的批判性阐释学和制度分析，对特定历史和文化中的性别社会分析等等”（Fraser & Nicholson, 1994: 249）

如果回到有学者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主要解释效力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作为历史和政治产物的性/性别体系的非自然化”，将“压迫作为分析中心并给与相应的解释和行动”，同时将“差异作为统治、剥削和异化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其条件”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保持对宏观社会结构的考察特别是对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分析和批判，进行对各种不平等的差异性的历史性解构，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的女性主义所吸纳运用的。对“再现”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物质性的关注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认清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关系的建构过程，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等方面的剥削、压迫和异化问题。

IV. 中国女性再现的批评实践

近期有学者梳理后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发现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领域，有学者探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有学者进行了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去本质化”和历史化的批评实践，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刘希：2021）。此外，也有中国学者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上进行过尝试和努力。贺桂梅（2017：70）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体性”问题上，就对福柯和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过重释和应用。她认为，福柯对主体性实践以展开的具体权力场域的关注，还有巴特勒对“操演性抗争”（performing protest）本身限度的洞察，都可以促使我们去发掘“操演者”所置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历史形态，因为“每个人只能在既有的权力结构内部来建构或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在反对本质主义的“主体性”阐释之后，贺桂梅对“非主体性”社会结构的关注又有了超越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中心主义的倾向。她认为，我们要注意“女性自我意识、社会身份、组织方式等的‘社会建构性’”，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文学、美学或文化研究之外的政治经济学讨论面向（贺桂梅，2017：70）。

对不同文化包括文学文本的政治经济学面向的讨论有很多成果。人类学家严海蓉（2010）对八十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的社会学解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严海蓉（2010：104-122）认为这部书写妇女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的小说，本可以成为反思社会再生产的价值、探讨社会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的重要起点，但最后性别问题在小说的解读及其接受中被隐去，而如果小说能够成为“知识分子负担”和阶层问题的表征，就可能让研究者审视改革的时代语境所塑造的小说的社会效应。“社会和政治的形势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及一个问题如何成为‘社会’问题。”（严海蓉，2010：110）严海蓉对该文本中后毛主义时代话语体系的剖析，让她深刻发现了小说对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价值差别构建的意识形态性。

美国学者艾米·多琳（Amy Dooling）在对当代中国“打工妹”的文化再现的研究中，也以强烈的政治

经济学视角对社会话语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她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女性农民从田间地头进入工厂的大规模流动如何催生了当代文学和视觉文化中对作为工人的妇女的新的想象与表现模式？在这些文化想象背后的政治运作是怎样的？这些再现优先化了谁的利益，最终又服务于谁的利益？”（Dooling, 2017: 135）在这里，“政治”的意义即为对“打工妹”个体命运的理解与对社会变迁和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及父权制的认识的关联，以及对后社会主义时期交叉性的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和挑战。多琳（Dooling, 2017: 141）最终的结论是，这些“在大众文化中传播的城市现代性和社会流动性的诱人形象，是推动当前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意识形态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再现”中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关系建构的研究，很多中国学者运用历史化和交叉性视角取得了重要成果。戴锦华（2007）的“阶级·性别与社会修辞”一文可以说是一篇典范性的研究。她以90年代影视作品中对下岗女工和“打工妹”的再现为例，在90年代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多种社会差异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阶层与性别话语和叙述的互相借重和遮蔽，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之一。

“阶级与性别命题的凸现，不仅在于它涉及被剥夺或牺牲的多数，而且在于它作为某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的症候，作为社会、话语、文化实践，其在强势/弱势、中心/边缘间所经历的复杂交错的历史演变，以及他们与多层面的社会现实，与多个权力中心的相对关系”（戴锦华，2007：370-371），这与亨尼西所推崇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症候式阅读”方法类似。将文本内在的矛盾看做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并努力揭露揭示文化文本中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以当代女作家张抗抗的中篇小说《芝麻》为例研究对进城保姆经历的书写，也发现了这个保姆故事中的文本内在矛盾和张力与城乡社会中深层的制度和结构化的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紧密关联。“文本对城乡等级化差异的质疑最终让位于认可和强化了这种差异的‘人口控制’和‘素质论’的社会话语；作者所声称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被更深层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话语和相应的文本策略深深地遮蔽了。”（刘希，2013：95）这个文本最终强化了改革开放后以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性话语。

在以上这些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文本的解构和分析都可以事先对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和它们之间交叉性关系进行深入认识。研究者们对于“再现”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性的坚持，对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不仅让他们认清了对各种差异的具体话语建构过程，更深入探讨了性别、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上剥削、压迫和异化这些社会问题。在维持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动态关系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议程其实可以兼顾对文化实践的研究和对压迫性的权力结构与物质关系的认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借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解构方法和批判性视角，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同时注重对物质性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思考，从性别、阶级、族裔等多重视角对文学和文化文本进行历史性和交叉性的研究。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议题可以既包括“对女性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成为某种女性意味着什么”，也可以导向“为何有压迫，以及如何终结它”。

参考文献

- [1]戴锦华.(2007). 阶级·性别与社会修辞. 严绍璦 & 陈思和主编. 跨文化研究: 什么是比较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355-371.
- [2]刘希.(2013). 现代性话语中的保姆故事. 妇女研究论丛(4), 95-102.
- [3]刘希.(2021). 后结构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以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妇女‘主体性’为中心. 文艺

理论研究(1), 177-188.

[4]刘希 & 郁旭映. (2023). 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探究. 文艺理论研究(3), 130-139.

[5]刘岩. (2011). 后现代视野中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 9-13.

[6]贺桂梅. (2017). 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5), 45-71.

[7]黄继锋. (2004). 唯物主义女权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3), 24-27.

[8]克莉丝·维登. (2011). 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 白晓红译. 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9]特里莎·德·劳里提斯. (2007). 社会性别机制. 佩吉·麦克拉肯 (编著).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03.

[10]苏红军 & 柏棣. (2006).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苏熠慧. (2016). ‘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 社会学研究(4), 218-241.

[12]王淼. (2008).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13]严海蓉. (2010). 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开放时代(6), 104-122.

[14]张也. (2018). 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国外理论动态(7), 83-95.

[15] Butler, J. (1994).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S. Seidman (Ed.),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3-170

[16] Cabrera, M. A. (2004).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M. McMahon, Trans.). Lexington Books, 161-162.

[17] Chow, R. (2001).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E. Bronfen & M. Kavka (Eds.), *Feminist consequences: Theory for the new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8-57.

[18] Cowie, E. & Adams, P. (1990). Representations. In *The woman in question*. MIT Press, 113-116

[19] Dirlik, A. (1999).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42), 1-34.

[20] Dooling, Amy. (2017). Representing Dagongmei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11)1, 133-156.

[21]Fraser, N. & Nicholson, L. (1994).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S. Seidman(Ed.).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2-261.

[22] Hall, S.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23] Hartsock, N. C. M. (1997).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eminist social thought: A reader*. Routledge, 461-484

[24] Hennessy, R. (1993).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25] Hershatter, G. (1993). The subaltern talks back: 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1), 103-130.

[26] Holloway, W. (1984). Gender differ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J. Henriques (Ed.). *Changing the subject: Psychology, soci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ivity*, 227-263.

[27] Kaplan, C. (2003). Pandora's box: Subjectivity, class and sexuality in socialist feminist criticism. In G. Green & C. Kahn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aylor & Francis Group, 147-177.

[28] Landry, D. & Maclean, G. (2005). *Material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

- [29] Pollock, G. (1988).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 Routledge.
- [30] Scott, J. W. (1986).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1053-1075.
- [31] Scott, J. W. (2001). Deconstructing equality-versus-difference; or, the uses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for feminism. In A. C. Herrmann & A. J. Stewart (Eds.). *Theorizing feminism: 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estview Press
- [32]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33] The Marxist-Feminist Literature Collective. (1996). Women's writing: Jane Eyre, Shirley, Villette, Aurora Leigh. In T. Eagleton & D. Milne (E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328-350.
- [34] Tormey, S. & Townshend, J. (2006). Post-Marxist feminism: Within and against Marxism. In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 [35] Wingrove, E. (2015). Materialism. In L. Disch & M. Hawkeswor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454-471.

A Study of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Feminism

Liu Xi (Dept. of China Studies, Xi'an Jiaotong - Liverpoo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Centering on cor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thodological trends and paradigm development in femin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 examines how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continue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post-structural theory while also integrating Marxist or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ositions to avoid the culturalist tendencies that post-structural theory might caus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materi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s alongside cultural criticism. Then it proposes to conduct historicized and intersectional studie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Keywords: Marxism; Materialism; Post-structuralism;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Criticism